

● 刘春英 著

日本女性文学史

本书将日本女性文学的总体发展历程放在广义的『文化语境』内进行解读，既对从古至今日本女性文学的成长脉络，同时又对日本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的主要成就进行了论述。

主编：尚侠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商務印書館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主编：尚侠

日本女性文学史

刘春英 著



2012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女性文学史/刘春英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06631 - 0

I. 日… II. 刘… III. 妇女文学—文学史—日本
IV. I313. 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082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丛书

主编: 尚侠

日本女性文学史

刘春英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6631 - 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定价: 32.00 元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大和、奈良时代日本女性的创作	5
第一节 大和、奈良时代日本女性生存的时代土壤	5
第二节 上古及万叶时代的女歌人	17
第三节 日本文化转折的奠基者——稗田阿礼	40
第二章 平安朝时代女性作家的创作	45
第一节 平安朝女性文学源头探微	45
第二节 平安朝女性文学的成型模式	59
第三节 平安朝女性文学的成型轨迹	65
第四节 平安朝女性文学的艺术成就	73
第三章 镰仓、室町、江户时代日本女性的创作	96
第一节 武家政治的确立与女性地位的衰微	96
第二节 镰仓、室町、江户时代女性作家的创作	102
第三节 出云的阿国	115
第四节 弱化的女性和角色心理与审美意识	120
第四章 日本近代女性作家的创作	126
第一节 启蒙主义思潮与近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126
第二节 樋口一叶的创作	133
第三节 与谢野晶子的创作	142

2 日本女性文学史

第五章 现代日本左翼女作家的创作	156
第一节 日本左翼文艺运动述略	156
第二节 宫本百合子与野上弥生子的创作	163
第三节 林芙美子与佐多稻子的创作	183
第四节 壶井荣的创作	195
第六章 日本侵华时期来华的日本女作家	205
第一节 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	206
第二节 反战同盟战士池田幸子	225
第三节 近代女性文学的拓荒者——田村俊子	236
第四节 牛岛春子与“满洲”	250
第七章 战后女性作家的创作	270
第一节 战后日本女性文学繁荣的时代土壤	270
第二节 战后女作家创作概观	281
第三节 有吉佐和子与山崎丰子的创作	305
第四节 大庭美奈子与津岛佑子的创作	322
第五节 林真理子的创作	334
第六节 吉本芭娜娜的创作	341
附录 日本女性作家年表	350
参考书目举要	393
后记	401

自序

——日本文化的变迁与女性人格的变异

公元712年问世的《古事记》，不仅为日本民族历史文学的滥觞，同时也揭开了蒙在大和女性头上的面纱。迄今千余年来，日本文学画廊中，林林总总靓丽的女性形象，纷彩多姿。伴随着朝政的更迭、世事的变迁，她们或幽怨满怀，踟蹰而行；或义愤填膺，铿锵而至；或也斜旧习俗的羁绊，袅袅独行，在历史的舞台上昭示了一段精彩的日本女性人格变迁史。

“文学作品中几乎所有的女性形象都象征着被抽象成原则的女性的本质”^①，都是那个时代所赋予女性的符号和代码，都鲜明地呈现出时代的烙印和痕迹。女性和男性同样是具有创造价值的人类，是社会的主体。然而在父系文化下，女性作为社会主体的资格被剥夺，从而被异化为男性的统治对象，从人类文化的角度认识这一主题，使我们不能不对探求日本女性发展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从人类冲出原始蒙昧状态，到现代文明社会崛起之前，被压迫、被奴役可以说是妇女的共同命运。但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

^① 水田宗子著，叶渭渠主编：《女性的自我与表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2 日本女性文学史

国家因其经济、政治、文化、风俗等各种不同因素的制约,所表现出的对妇女的压迫和奴役的程度与方式又千差万别。

在日本历史上,女性地位的演变可以说是呈现出一个 V 字形。自大和时代^①起,日本女性虽然和男性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但是上古时代流行的母系社会残留的婚姻形式——访妻婚,随着生产力的发达,物质生活的丰盈,婚姻形态内质的变化和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女性地位的渐趋式微,至中世纪武家社会时期,开始接近消亡。明治维新时期扑面而来的西风以及强化型教育制度的普及,使日本妇女的自主意识开始抬头,但是社会惯习中为女性设定的“贤妻良母”之角色,导致男尊女卑制度之横行,使日本女性长时间内作为历史舞台上的配角,其主体意识以男性主体意识延长的形式被禁锢了。直至 20 世纪初叶,女性渐始与男性于一个平台上开始追求真正的“人”的生活。但是女人首先作为一个人,不拘哪个时代,都有生存的权利,都会有自己的主张和声音。尽管自奴隶时代起,男尊女卑的社会习俗将女人渐趋置于男性的樊篱中,她们的人权、她们的希冀、她们的憧憬,在男权统治的漫漫历史长河中被动地浮游,但还是不时地泛起几朵绚丽的浪花。

日本文学绵延千载,其中女性创作功不可没,且不说有幸作为日本第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古事记》口诵传承人的稗田阿礼和跻身于日本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中的那些众彩纷呈的靓影,单是其后

^① 大和时代(250—538 年):指日本定都于大和地区(位于现奈良)的时代,其间,国王屡次在此范围内迁都。因当时统治者大量营建古坟,又称古坟时代。古坟的分布基本上遍及本州岛南部,以奈良、大阪的大和盆地为主。此期最大特色是圣德太子仿效中国隋朝提出《十七条宪法》。

绽放于平安朝^①的随笔文学、物语文学、日记文学等多种体裁中的巾帼佳作,已足以使我们充分地领略到了日本古代文学的巅峰美景。进入近代,伴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思潮的袭来,日本近代文学中个性开始觉醒,人性开始复苏,加上十月革命后左翼文学开始崛起,导致了众多的“娜拉”走出封闭的家庭,其与文明相呼吸的近代人的自我意识及其反封建压迫、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都在一段时间内对中国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物质生活的骤丰,妇女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闻媒体的发达,日本女性文学又迎来了第三个创作高峰期,一大批才华超群的女作家登上文坛,在各种题材的创作上,留下很多令人难忘的作品,这在亚洲都是一个特殊的范例。她们所起的时代先驱作用,令许多须眉男子都难以比肩。难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说:“不远的将来,在日本,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的,唯有(日本的)年轻女性们……”^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日本女性文学研究渐趋繁荣,尤其是近年来,陈岩、刘利国两位先生合著的《日本历代女诗人评介》、肖霞教授等著的《全球化语境中的日本女性文学》及张晓宁教授撰写的《日本近代文学的女鬼才——与谢野晶子论》等几部大作的问世,加之屡见于报纸杂志上的关于日本女性文学的高论,以及各种版本的《日本文学史》中对女性文学的译介,标志着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曾经对本人的治学产生了重大的启迪作用,也是激起我撰写此书的诱因之一。但是略感遗憾的是,迄

① 平安朝:桓武天皇于延历十三年(794年)将京城迁至平安京(今京都),至1192年源赖朝创立镰仓幕府止这段时间。

② 匡文立:《和服下柔肠百结》,载于《中国图书商报》2002年1月24日。

4 日本女性文学史

今中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日本女性文学史及同类的译作问世。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固然有其被介绍的价值,但对我们这个东邻经济强国和世界上的一个文化输出大国中占其一半人口的女性和女性作家进行了解和研究;亦不是没有裨益的。

国内在如何解析日本女作家群体文学本源的问题上,较为流行的是止于平面的表象式的论述法,聚焦于“女性”在日本文学创作中的积淀,这种单一的评价,显然有悖于日本古代女性文学生成的基本逻辑及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核。毋庸置疑,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囿于“文学史”的范畴来认识日本古代文学,这种狭隘的作业方式,使我们很难准确地解析导引日本古代女性文学发生的许多真正原因及其生成的最基本因素。倘若我们能够换一种思维方式,以“文化意识”为引导,跨越“文学”的界限,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语境”内解读日本古代女性文学,关注“女性文学之本”,即其成型的真实源头、成型的轨迹和成型的模式,以及这种弱化的社会角色所呈现出的女性意识和政治社会意识,乃至人格变异的研究,这将不啻为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本书欲将日本女性文学置于整个日本女性发展史和日本文化史的背景之内,以尽可能开阔的视野把握日本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力图在斑驳纷杂的女性文学创作实践中,耙梳葺理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以飨读者。

第一章 大和、奈良时代 日本女性的创作

第一节 大和、奈良时代日本 女性生存的时代土壤

据史学家考证，在一万多年以前，日本列岛上就有了先民居住，到了汉魏时期，中国的史籍上开始收录有关于日本列岛的些微文字。问世于公元 712 年的日本第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古事记》及在《古事记》成书前流传的一些后来被收入《万叶集》中的和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列岛上生存的大和民族先民的生活状况，尤其是隐于其中的日本历史的更迭，及其带给日本女性的沧桑命运。

在人类的历史源头，曾经有过妇女辉煌的时代，“当时妇女不仅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而且往往占有很高的地位，”^①恩格斯将这个女性辉煌的时代称为母权时代，日本乃至世界各国的“考古发掘的材料及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都可以验证那时人们对妇女的尊崇”。而母系氏族社会妇女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首先是因为“妇女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当时人们按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3 页。

6 日本女性文学史

年龄、性别实行自然的劳动分工,男子从事劳动强度大的狩猎、捕鱼等,女子则从事采集、种植和家务劳动。妇女从事的采集活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可以保证人们经常性的食物来源。另一方面,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氏族的生存取决于劳动力的强弱与多寡”。^① 人丁兴旺是人们企盼的目标,特别是当时人类自身繁衍能力低下,妇女的生育功能对促进部落力量的强大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故女性以生育功能建立了母权制基础。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男性在生存竞争中逐渐占了上风,渐趋凌驾于女性之上,并最终以体力之优势奠定了父权制。

在每个民族的语言产生之前,早期的神话往往承载着原始初民最初的记忆、生活经验、所信守的道义和理念。《古事记》中大国主神的神话,作为原始初民传达意识的载体,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将日本早期社会发展演变情况展示于世,成为我们考察日本古代社会的珍贵资料。大国主神少年时遭遇两次生死大劫,都是其母亲助他转危为安的。母亲的形象,标志了生命原初阶段女性的非凡地位。及至年长,随着权势的增强,大国主神游弋于数个女性之间,使对其辅佐甚久的原配须势理毗卖忧心忡忡地意识到,身为男性的夫君可以遍寻天下芳草,可是身为女性的自己除了大国主神以外,形单影只,没有别的“相好”,没有别的“丈夫”。其地位江河日下,及至后来不得不在拥有三房六妾的丈夫面前折腰。

“私有制产生后,带来了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社会的分工催化了家庭内的分工,谋取生活资料逐渐成为男子的事情,家庭内的财产

^① 张凤华:《妇女地位的历史考察》,《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6期,第75页。

也落于男子的执掌中,妇女被排除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①也就是说,“随着私有财产制度确立的同时,妇女也成为了男子的奴隶。从女性主体人格的失落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文化的悖论”,即“女性为畜牧业和火的发明做出了重大贡献,从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却暴露了其在农牧业等生产领域的弱势”,从而最终将自己推向从属的桎梏;女性的生育为人类的繁衍做出了重要贡献,却因此被剪断了翱翔的翅膀,被囚闭于家室;男性在求生的拼搏中,创造着“文明”,使自己成为人,却把女性贬为对象和工具。男权的诞生,就是女性人格失落的开始。^②

日本的神话、古歌谣等口传文学,不像中国的神话、古歌谣那样散见于各种典籍中,而是集中地收录在《古事记》(712 年)、《日本书纪》(720 年)和《风土记》(715—733 年)以及《古语拾遗》(807 年)中。^③《古事记》“可谓是一部绝好的民俗学资料”,因其中隐含着大量宗教思想,“日本神道教因此把《古事记》奉为教典”。《古事记》开篇记载了日本国土和人种的起源。日本的历史于是被分为“神代”和“人代”两个阶段^④。其第 7 代神中“第一个出场的有名有姓的女神是‘伊耶那美命’,这也是首次点出其性别特征的女神,该形象与此前诞生的神大大不同,即不是自然地从地下冒出来,而是由无性繁衍转向了男女结合的两性繁衍。伊耶那美命第一个有了自己的配偶,即男神伊邪那岐命,并通过婚姻和家庭来延续自己的

① 张凤华:《妇女地位的历史考察》,《社会主义研究》1998 年第 6 期,第 76 页。

② 韩贺南:《文化变迁与女性人格》,《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 年第 1 期,第 50 页。

③ 李均洋:《日本文学的发生和起点》,《外国文学评论》1999 年第 1 期,第 92 页。

④ 郝祥满:《日本人的色道》,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4 页。

后代”。^① 有趣的是，伊耶那美命与伊邪那岐命的婚姻同中国神话传说中伏羲、女娲的婚姻一样，均是兄妹婚。两者均反映了原始时代氏族社会一度出现过的血亲婚配现象。

书中描写兄妹两独神受命于天之御中主神^②的命令，以“日本男根”之象征“天之琼矛”搅动海水，成“自凝岛”后，降至岛上，建立“天之御柱”，约定二神绕柱而行，相遇后婚配。他们第一次碰面时，女神先开口说道：“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啊！”随后男神也叫道：“多么美丽的姑娘啊！”^③“可以认为，这是一首依附于具有原始宗教性质的原始婚姻性交礼仪的男女对唱歌谣。”^④可是，“行闺房之事，生子水蛭子”，后二神“往天神处请教”，神告曰：“因女人先说，故不良。可回去再说。”^⑤他们“仍如前次绕天之御柱而行”，男神先开口，女神次之。这一次复会接连顺利生下了日本最初的国土——八个岛。“显然，两次结婚仪式代表日本远古时代婚姻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即从母系社会转移到了父系社会。”^⑥这也是世界各民族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的妇女被统治、被奴役的时代。

值得深思的是，女性主体人格的失落并不是大和先民的独创，“而是具有世界文化的共性”。“男尊女卑，对于女性来说尽管更多地体验了文化的丑与劣，然而它绝不是自然化的过程，而是人类历史

① 肖书文：《从〈古事记〉看日本妇女性格的形成》，《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357页。

② 宇宙中央之主者，代表宇宙之根本。

③ 安万侣著，周作人译：《古事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4页。

④ 李均洋：《日本文学的发生和起点》，《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第95页。

⑤ 安万侣著，周作人译：《古事记》，第5页。

⑥ 肖书文：《从〈古事记〉看日本妇女性格的形成》，《湖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357页。

发展的必然抉择。”“人类何以做出如此选择,如果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认识这一问题,则不得不承认,它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适应生态环境所创造的文化,尽管这种文化太普遍也太残酷。这就是人类走出自然的必经之路。”^①《古事记》和《日本书纪》^②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后平安王朝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正好如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变化的过程。虽然主管高天原的天照大神在父母最后晚生的三个孩子中地位最高,这有悖于父权社会中长子继承制,但这恰恰是反映了母系社会的幼子继承制的残余。^③

《古事记》作为日本历史上问世的第一部作品,传说、史实、虚构并存。里面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其中着墨最多、形象最活灵活现的就是天照大御神^④。父神伊邪那岐命让她与弟弟须佐之男命分别治理高天原和海原。就实际权限来说,姐姐的权限更大些。一次被父神驱逐出家门的弟弟须佐之男命来高天原处滋事,天照大御神生气躲进山洞不出来,于是“高天原立即黑暗”,“变成永久之夜”^⑤。众神为了让世界重现光明,费尽心机将她诱出洞,最终“天照大御神即出岩户,高天原与苇原中国都自然明亮起来了”。^⑥ 须佐之男命的横生滋事,表明了男权对女权的挑战,但是最终须佐之男命的受罚败北、臣服于太阳女神,标志着“以日为本”的国土确立了女性中心的文化传

① 韩贺南:《文化变迁与女性人格》,《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期,第49页。

② 《日本书纪》:日本第一部官修编年体正史,720年舍人亲王(677—735年,天武天皇第三子)等撰,记录神代始至持统天皇时的历史。

③ 叶舒宪、李继凯:《太阳女神的沉浮》,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④ 天照大御神:又译作“天照大神”,即指高天照耀发光的日神,也就是所谓的“太阳神”,被奉为高天原(神灵界)上的主神。

⑤ 安万侣著,周作人译:《古事记》,第14页。

⑥ 同上,第15页。

统。天照大御神成为世世代代日本人心目中的神话母亲的原型。^①

《古事记》成书于8世纪,而此前的7世纪上半期开始的律令制时代^②,“正是日本女性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原因之一即是该时期女性在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日本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然长期保留着母系制的残余。其突出表现就是长期流行招婿婚,即是以女方为婚姻的主体、招婿上门的一种婚姻形态,与男娶女嫁正相反。最为典型的是招婿婚的早期形态,即存在于大和时代并延续到平安时代的访妻婚。这种家庭结构多以妻子为中心,子女由母亲抚养,家政由她们掌管。”据考证,直到10世纪以前,日本的女性多以“刀自”、“刀自卖”相称,而据《广辞苑》之解释,“刀自”意为“掌管家政的妇人”^③。

这种社会世态,造就了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母权相应受到人们的尊重,日本历史上从6世纪末至8世纪出现的“女帝现象”恐怕就是与此密切相关吧。这一时期有8代共计6位女天皇秉政^④。这6位女帝的登基有各种缘由,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女帝”现象的出现与日本母系社会的遗存,与女子掌权密切相关;其时女性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权限,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古事记》中伊耶那岐

① 叶舒宪、李继凯:《太阳女神的沉浮》,第8页。

② 律令制时代:645年,日本进行大化革新,效法中国的隋唐政治制度,由国家制定律令,目的在于以法律形式加强中央集权和政治统一。9世纪,摄关政治产生后,律令制渐趋废弛。

③ 李卓:《律令制时代的家庭与婚姻》,《日本学刊》1995年第2期,第120页。

④ 6位女天皇:从公元592年到770年,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古代日本出现了8代6位女天皇,总计在位时间近90年,形成了日本历史上特有的女帝时代。6位女天皇及其登基的时间分别是:推古天皇(592年)、皇极天皇(642年)、持统天皇(686年)、元明天皇(707年)、元正天皇(715年)、孝谦天皇(749年)。其中皇极天皇和孝谦天皇为两次登基,更名号为齐明天皇(655年)和称德天皇(764年)。

命去阴间寻找因生小孩而烧伤致死，在阴间早已蜕变成面目狰狞的女鬼妻子伊耶那美命时，被吓得仓皇出逃，感到受了侮辱的妻子“更遣八雷神，率领千五百名黄泉军来追赶和报复丈夫”^①这一故事成型之缘由了。可见在世人的脑海中，妇女在阴间地府还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点与我国阎王爷执地狱牛耳之形象截然不同。

日本自大化革新^②后，急于使自己能与东亚的大唐政权比肩而立，政治经济制度都取之于先进的大唐，在婚姻与家族制度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不过，“因日本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去甚远，有些法律条文便不可避免地与当时的历史现实产生落差”^③。而日本律令制时代的情况是氏族刚刚解体，整个社会处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期，“访妻婚”没有消失，以父权制为代表的家庭尚未普及，这些都使得维护父权与夫权的法律很难对人们产生约束力量。而彼时的大唐早已进入家国一体的高度成熟的封建主义社会。^④ 日本在大化革新后建立的中央集权制远不如唐土。所以，当时以圣德太子^⑤为首的宫廷权贵，为了巩固新兴的皇权，首先仿效唐律，加强父权制，从法律上提升和巩固父亲在家庭、家族中的绝对统治权。

① 安万倡著，周作人译：《古事记》，第9页。

② 大化革新：公元645年，皇太子中大兄皇子在中臣镰足协助下，在宫内杀死苏我入鹿，确立起自己的统治地位，改年号为大化。其实质是要废除皇族及地方豪族特权，把全国土地及人民划为天皇所有，实行“班田受授法”。

③ 李卓：《律令制时代的家庭与婚姻》，《日本学刊》1995年第2期，第107页。

④ 同上，第121页。

⑤ 圣德太子(574—622年)：本名上官廬户丰聰耳皇子(廬户皇子)，别名为丰聰耳、上官王，是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家，推古朝改革推行者。父亲是用明天皇，母亲是钦明天皇的女儿。公元592年大和豪族苏我氏外孙女丰御食炊屋姬即位为推古天皇，593年立外甥圣德太子为皇太子辅佐朝政。圣德太子辅政后即大力进行改革，即推古改革，并遣使人隋、唐学习中国制度。后推行新政，制定冠位十二阶、颁布律法十七条、采用历法、编修国史、使用天皇名号、兴隆佛教。

“除了制定维护父权家长制的法律外，律令国家的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倡导从中国传来的人伦礼教关系。‘孝’是中国古人行为规范的最高准则，在家庭中贯彻‘孝’的目的是‘齐家’，把它进一步扩大，就是‘治国平天下’”^①，这些深得日本统治阶级推崇的夫权、父权，在《古事记》里已经初露端倪。

我们前面提到，《古事记》开宗明义，描写了伊耶那美命和伊耶那岐命两位神举行婚礼时，由于女神先于男方开口，而导致婚后产下怪胎，原因是“牝鸡司晨不吉利”。后来重新修正，方才生下八个大岛。显然，神话传说中，日本国土的成型，日本民族的建立，就是父权制社会击败了母系社会的遗痕。

而父权制的建立始于私有财产的积累，男性对于女性的贞操，对于能够继承自己财富的嫡系血统子孙的注重，也是夫权社会的一种惯常陋习。《古事记》中天照大御神的儿子番能迩迩艺命觊觎大山津见神次女木花之佐久夜姬的“艳丽”，向她求婚。木花之佐久夜姬怀孕了，番能迩迩艺命竟怀疑其不是自己亲生的骨肉，说“一夜就受孕了，这不是我的儿子”^②，于是少女只好发誓，做一件危险的事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分娩时在“殿里放起火来，生下儿子”^③，估计这是当时的一种宗教仪式吧。母子平安，这才在丈夫面前洗刷了自己的清白。“如果仅以此作为考察律令制时代家族状况与家族制度的依据，则很容易误导出日本父权制家庭已经确立的结论。”实际上，“律令制时代父权制虽已产生，但尚未达到绝对统治的地位”^④。由

① 李卓：《律令制时代的家庭与婚姻》，《日本学刊》1995年第2期，第110页。

② 安万侣著，周作人译：《古事记》，第40页。

③ 同上。

④ 李卓：《律令制时代的家庭与婚姻》，《日本学刊》1995年第2期，第111页。